

李浴日的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编译和研究

李龙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今德国）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他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理论总结以往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基础上写成了《战争论》，揭示了战争的基本原理和指导战争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因而被誉为“西方兵圣”。该书自 1832 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各军事学家和政党领袖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成英、法、日、俄、汉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军事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国、共两党对它的传播和研究都非常重视，因而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和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李浴日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中国的早期翻译、推介和研究的专家。早在东瀛留学期间，他编译《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时就多次对该书加以引用和评述，在往后的 20 多年间，他在其出版的有关论著中曾从多个方面进行论述，形成了他的看法和观点。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我们回过头来梳理他的这些看法和观点时，发现它极富有远见性。为了批判地吸收西方优秀军事文化遗产，现对其编译情况加以总结，并对其研究的观点进行初步的归纳、探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翻译出版成田赖武编译的《战争论纲要》，汇编出版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成果。

《战争论》传入日本后，一直受到该国军事界的推崇。对日本军事人才的培养起了重大的作用。1940 年，日人成田赖武“有感于将战争的一般理论介绍于世人的必要”，把它编译成日文。编译时，“系将克氏《战争论》作简明的介绍，毫无凭著者的臆断来修正补充，惟鉴于近代战争的实情，自然省略其应废弃的部分，或在重要部分，用‘附说’加以说明。”⁽¹⁾书名定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

要》。出版后以日文形式传入中国。1943年春，李浴日赴重庆进行文化劳军时在“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图书室”借得此书。在翻译条件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把它译成中文：“先在桂林译就‘总论’，继在韶关一个山岗上费了两个月的工夫，译成全书。”⁽²⁾该书初名《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当时正值抗战军兴，颇受欢迎。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李浴日重返南京将此书再版，杨言昌中将为该书作序，1947年，出版第3版时，改名《大战原理》。1950年李浴日到台湾，于次年9月在台湾首版，“为求显明计，仍用原名。”书名由胡璉上将题签，徐培根上将在再版时题词。至1956年6月，该书在台湾出版了第4版。此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本世纪初在台湾多次重版，至今一共出版了10多版，成为民国以来海峡两岸颇有影响的军事译著。

《战争论纲要》是解读克氏《战争论》的重要著作。夏征难在《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附录中把此译著列入研究克氏的早期重要专著。全书20万字（内有图表60余篇），包括序言、总论、主要内容、结论及附录；主要内容分八章，分别为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理论、战略、战斗、战斗力、守势、攻势、战争计划；附录共收入三篇文章：万耀煌的《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杂记》，松村秀逸作、李纯青译《克氏战争论是腓特烈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结论》，李浴日的《依克氏战理论台湾攻防战》。由于“日本成田赖武取克氏之书，汰其陈旧，删其繁冗，期合于时代之要求，用意至善；惟苟摈弃克氏之方法论于不顾，而徒以克氏之若干命题，视为黠武主义经典，是则重违吾人研究克氏之本意矣。”⁽³⁾因此，李浴日翻译出版此书，对人们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来源的认识、借鉴西方军事理论，开展抗日反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普遍欢迎。正如杨言昌将军评价道：“友人李浴日先生夙治孙子，蜚声论坛，兹复译成田氏（成田赖武，笔者注）之书，知余克氏学说之介绍不无些微因缘，乞为之序，爰书所见如此。”⁽⁴⁾徐培根将军也评价说：“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为西方兵学名著……惟卷帙浩繁，文辞艰深，余友李浴日先生，先曾与以摘译，编为纲要，提精取华而综核原义。”⁽⁵⁾以此可知，李浴日对推动《战争论》在中国的普及和研究功不可没。

李浴日在编译《战争论纲要》的同时，还汇编出版孙、克学人研究成果《东、西方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年2月）和《孙克兵学新论》（1946年2月）。这

是近代第一次结集出版的研究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论文集，也是第一次出版的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比较的论文集。在所收集的作品中，“除发表作品外，尚有特约稿数篇，这是值得一提的。”也就是说李浴日除了把公开发表的论文汇编之外，部分论文是亲经他稿约的。汇编论文克氏部分主要包括：吴石《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林薰南《如何研究〈大战学理〉和我们怎样学克氏》、万耀煌《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杂记》、松村秀逸著，李纯青译战争《克氏〈战争论〉是腓特烈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结论》、萧天石《克氏军事天才论阐微》、彭铁云《孙、克两氏兵学思想的比较及其批评》、陈南平《孙、克两氏兵学思想之时代背景及影响》等。这些论文集，作者大多为军界中将以上或文化名人。如吴石(1894~1950)，福建闽侯县人，中将，曾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林薰南(1890~1982)，湖北黄冈人，抗战将领，著名粤北会战及曲江保卫战的筹划指挥者，民国政府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中央兵学研究院中将院长等职。万耀煌(1891—1977)，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师长、军长、军团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等职。李纯青(1908—1990)，福建安溪人，文化名人，后任台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萧天石(1908—1986)，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这部分论著，有的是对克氏理论进行解读和论述，有的则对孙、克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它们代表国民政府克氏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克氏研究的时代动态。李浴日把它归为“克氏之部”，与“孙氏之部”进行比较，以增进人们对这两部军事巨著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此外，在《世界兵学》月刊里，他也较注意收集、刊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在《世界兵学》第6卷第1期，刊登加藤哲三著、谭善如译的《克劳塞维茨和鲁登道夫的见解》，在《战斗》月刊中刊登刘闻祖的《论克、约两氏的战争艺术》等，对扩大克氏军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陈南平在《孙、克两氏兵学思想之时代背景及其影响》的前言中称：“李浴日先生对于兵学甚有造诣，而对孙子及克劳塞维茨两氏之兵学研究尤深，比者曾译著《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及《中山战争论》，均有精深之列，为世所钦崇，今者特编是册，其裨益于吾国兵学界，绝非浅鲜，因李浴日先生之编是册，其着眼甚高而富意甚深也。”⁽⁶⁾邵青在《民国政府与民国孙子学的发展》里评价道：“李浴日编辑的《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该书为近代第一部研究孙子和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论文集，共收录了论文十一

篇，其中孙子兵法研究类六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五篇，对孙子兵法与战争论进行比较研究。作者多为当时国民党中、高级将领，如万耀煌的、林熏南、吴石等。”
(7)可见李浴日这两本书在孙、克两氏比较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了。

二、对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理论做综合阐述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用哲学思维方法分析战争现象，形成了他的战争哲学思想。李浴日在《战争论纲要》第三版序言中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思想家恩格斯评价说：‘我最近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深觉其具有独特的哲学方法，就内容而说，也是一本很好的书。’”⁽⁸⁾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体系非常庞大，理解非易。李浴日着重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的来源、战争的本质、辩证法问题、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进攻和防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进行了相关学理的应用。

(一) 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的来源。

李浴日认为，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在 1951 年 9 月台湾版《〈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序言》中，他对这个问题做了概括。他说：“他（指黑格尔，笔者注）是战争政治学的建立者。”“欲研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战争论，不可不懂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哲学，因为克氏受黑氏哲学的影响太大了。黑氏与克氏生于同一时代，其影响于克氏，正如老子影响于孙子一样。”⁽⁹⁾李浴日分别从克氏战争哲学中的“绝对观念”来源于黑格尔及其批判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建立起他的战争理论体系两方面进行了评述，探讨其战争理论的渊源。

关于克氏战争哲学中的“绝对观念”来源于黑格尔这个问题，李浴日主要从克氏关于精神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去阐述的：“黑氏是一个观念论者，如《历史哲学》一书，强调宇宙的本体是‘绝对精神’，‘理性统治着世界’，‘根据思想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这确给予克氏很大的影响。在克氏以前的兵学都是崇拜几何兵学的战略态势，或囿于物质威力的比较，而克氏却能认识精神在战争上的重要性，并列精神要素为五大要素之首位。”⁽¹⁰⁾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精神因素(或精神力量、精神要素、精神素质等)，主要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国民精神等。在“军事天才”一章中，他曾经专门探讨了统帅的才能问题。克氏认为，

精神因素十分重要：“精神力为军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战争全部因素无不受精神力所贯注，而为其操纵。”“精神的诸力足以影响军事行动的全体，而且军队的运用，也是凭于指挥官的意志力而决定，即军队与将帅、政府等的智能及其它精神上的各种特性，战地的人心，战胜战败的影响等都足给予军事行动的重大影响。”⁽¹¹⁾李浴日引述克氏关于精神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去阐述克氏战争哲学中的“绝对观念”来源于黑格尔的观点，表明克氏已经充分认识到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辩证看待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说明克氏的战争哲学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同时也说明李浴日充分肯定克劳塞维茨对黑格尔“绝对观念”的合理吸收。

“黑氏在哲学上贡献最大的还是他所建立的辩证法 (Dialectic)，克氏《战争论》的特点就是接受了黑氏这个哲学方法论，他的《战争论》是一贯地用辩证法写成。日本研究克氏战争论者亦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根据而更发扬光大了……他的理论虽不完整，但一贯地用辉煌的辩证法写成，这证明他所用方法的伟大。’”⁽¹²⁾这是李浴日对于克氏批判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建立起他的战争理论体系的另一个观点。对于这个观点，他主要从克氏战争哲学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构成进行了解析：

首先，克氏运用了黑格尔辩证法则中的“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来说明“观念”：“‘正反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则，克氏则用以分析战争现象，阐明战争原理，建立他的战争理论体系……‘战争是交战双方各为屈服敌方意志之无界限的努力。’于此又分为：‘(1) 暴力使用的无界限性……(2) 打倒感情的无界限性……(3) ‘力’之发挥的无界限性……’都是从‘正’（我）‘反’（敌）双方来观察，再发展为‘合’——‘打倒敌人’或‘压倒敌抵抗力为止’（亦即否定的否定）来说明观念。”⁽¹³⁾

其次，克氏用黑格尔辩证法（对立统一法则）来研究战争的防御与攻击：“原来所谓防御与攻击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但克氏却作统一的观察。”如说：防御中伴着攻击的动作，攻击亦伴有防御；“战略攻势中的防御是攻者所犯的弱点，即矛盾说：‘A、战略攻势的防御足以拘束攻者的突进，此际的防御不独不足以强化攻击，反会牵制攻者的行动，及消耗其时间，徒足增加防者的准备之利。B、战略攻势的防御比一般防御为易败的作战形式。何故？因为攻者不能享受战斗的

准备，地形的熟识与利用等防御上的利益，全陷于被动的地位。’（均见第七篇第一章）”，说明防御与攻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又如“……军事行动的休止与紧张，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等也是作对立统一的观察。至于在整个战役上由守势到攻势，或由攻势到守势的转换及其过程，这是从量到质的变化。”⁽¹⁴⁾

再次，克氏用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变”（变化与发展）的概念对待不同时期的战争理论：“克氏在《战争论》上独能打破形式逻辑，方式主义，武断主义与机械论，这也是基于辩证法的观点。”李浴日指出：“‘在各时代便有各时代独特的战争理论。’亦即说，战争理论是要跟着时代而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变化与发展）是辩证法的最基本概念，而克氏在《战争论》上正充分表现了这个概念。”⁽¹⁵⁾

李浴日关于克氏战争哲学的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的论述，揭示了克氏战争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联系，对人们认识克氏战争哲学的实质、把握克氏研究战争的规律和办法起了积极的作用。

多年以来，关于克氏战争哲学思想的来源国外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如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J·F·C 富勒和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就认为它来源于康德，是唯心主义二元论。而李浴日（包括同时期的军事学者杨言昌等）却自觉地接受了它来源于黑格尔的观点。其实，这本是马克思经典学家的观点。列宁在 1915 年 5 月完成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书中认同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原理时就说过：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受孕于黑格尔”。近 20 年来，中国大陆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研究专家对克氏战争哲学理论的来源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夏征难在《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克氏战争哲学理论的来源有二方面：一是受康德影响，二是受孕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哲学有决定性影响。”（详见夏征难《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第二章）可知，黑格尔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说明二人的思想联系极其密切。李浴日等人认为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观点为后来中国军事哲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战争的定义

在李浴日的著述中，概括克劳塞维茨战争的定义有三处：一处是《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的定义》：“西洋兵书所下的定义，向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

定义：‘战争是为屈服敌人，实现自己意志而行使的暴力行为。’为正确恰当。”

一处是《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战争思想》：“克劳塞维茨氏关于战争的定义说：‘战争的基本要素，是两人以上之间的斗争，即决斗，战争不外是决斗的扩大。’跟着说：‘战争是为屈服敌人，以实现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克氏又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的行动，实为一种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对外关系的继续，而以其他手段（暴力行为——浴日注）施行之。’”

一处是《孙子新研究·始计第一·战争定义的种种》：“不过大家一致推许的，乃为克劳塞维茨将军的定义，彼在其名著《战争论》上说：战争不外以别的手投（强力手段）而进行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决斗的进化。……因之所谓战争是屈服敌人而实现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

对于这三处概括的定义，李浴日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说明。第一处指出：该定义“但稍嫌限于武力战。降及今日，以战争已进化为全体性的战争，全球性的战争，又为反侵略的战争。”⁽¹⁶⁾这是李浴日从现代立体战争的范围综合概括的，说明李浴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克氏的战争定义。第二处他是从战争的本质概括其定义。第三处他对“战争是屈服敌人而实现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克劳塞维茨以后，因为‘社会的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所以把近代战争，单认为政治的继续，尤其不问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暴力，都是错误的；因此，便不能仅以军队为主的武力行为当作战争的手段了。”⁽¹⁷⁾所以，战争的定义必须要以和平为归宿。他给战争下的定义是：“‘战争是全球各民主国家发挥全力以粉碎侵略、屈服敌人、而维持民族国家之生存及保障世界之和平的行为。’此行为包括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的一切战争行为。”⁽¹⁸⁾李浴日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克氏战争的定义做了扩充，并把战争的正义性作为评价的标准：“显然是从战争的正义性角度来进行的，排除了战争的非正义性。”“由此可见李浴日所主张的战争是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保护世界和平的战争，而非侵略战争。不仅如此，而且把战争扩展为包括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的一切战争，改变了以往人们所认知的战争乃局限于军事对抗的战争。”⁽¹⁹⁾

（三）战争的本质

“在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中，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最受人重视的就是他

在马克思诞生前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继续’的著名论断。”⁽²⁰⁾从而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克劳塞维茨是在考察绝对战争和相对战争之所以存在差别时提出这一问题的。李浴日认同这个观点，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述析：

第一，“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手段（暴力行为——浴日注）实现意志的行为。”

李浴日首先从战争是政治的手段，并且是政治的特殊手段进行分析，说明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差别性。他说：“根据克氏的意见，战争为政治的手段，用以贯彻政治目的之手段。”⁽²¹⁾“黑氏说：‘在历史的现象中，是以战争防止国内的不安，加强国内的团结的形态而出现。’这是把战争当作政治的一种手段的。”⁽²²⁾他以普法战争为例说明战争为政治的手段：“在普法战争中，普之胜法，固胜于色当一役，亦由于俾士麦和英联奥及对俄调协，使法国陷于孤立，以协助军事。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意之胜英，虽胜于苏费立倭一役，亦由于加富尔运外交手段，联法联英，及对普亲善，得以全力对付奥国，这是两大显著的例证。”⁽²³⁾同时他又认为，战争并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殊的政治。他在《中山战争论·战争与政治》中，从内政与外交为政治的两大形态说明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内政与外交为政治的两大形态，关系战争的胜败至钜。倘若内政与外交俱不配合战争，甚至背道而驰，非导致战争失败不可。”⁽²⁴⁾就内政来说，“足以影响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从外交而论，“外交与军事本为‘难兄难弟’，在战争未爆发之前，外交可代替军事，战争一经爆发之后，外交就要协助军事。”他引用孙中山的论述说明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他（国父）说：凡国家之国策已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战争既毕，仍当复于外交之序。故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时多战争手段之时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则，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尽，无可如何之谓也。”⁽²⁵⁾李浴日把内政和外交作为政治的形态进行阐述，说明它们与战争的区别和密切关系，这一论述充实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内容。因为克氏并没有把内政作为政治的形态进行详述。李浴日的论述，深化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观点，这是李浴日对民国时期克氏战争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第二、战争和政治目标是一致的。

李浴日接着分析这种一致性的表现。其一，将帅也是政治家：“克氏说：‘凡为指挥一种战争或一幕战役的重大活动，而取得光荣的胜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别高见不可，所以战争和政治是一致的，将帅也是政治家。’”⁽²⁶⁾他引用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论述，说明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如果说军人不干涉政治，还可以讲得通，但说不懂政治，便讲不通了。用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所以军人当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么是政治。”⁽²⁷⁾说明政治不能违背战争的性质。其二，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战争：“战争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德国的战争思想是德国政治思想的反映，英国战争思想是英国政治思想的反映，苏联的战争思想是苏联政治思想的反映，现在我国（指民国，笔者注）的政治思想是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自然我们的战争思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即为实行三民主义，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为国家而战的战争思想。⁽²⁸⁾其三，战争反作用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战争所要求于内政，最要紧的是举国团结一致。因为举国上下及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才可以构成强大的力量，协助战争，支持战争……所以在内政上就应设法促成全国的团结一致，能如是，则不会发生无谓的磨擦，以相抵销，更不会被敌人挑拨离间，以分裂力量了。”⁽²⁹⁾虽然李浴日认同战争是政治延续的一种手段，“但克氏是为战争而战争，却不问政治目的的好坏。”他强调，只有“为革命而战争”，为正义而战争，才是战争的目的。李浴日关于战争本质的透切论述，说明李浴日与克氏一样对战争的思考并不囿于单纯的军事范围，而是把政治与军事视为一体，反映了他从战争的内在联系去探求战争本质的，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不过，他所称的“政治”和“正义”，属于孙中山三民主义范畴，与马克思经典学家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区别。

（四）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侧重点。

李浴日在《孙克兵学新论》里，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所论述的战争侧重点进行了归纳，认为克氏的论述重点放在陆战方面，它主要是关于陆战之书（但所涉及的战理可应用于海战和空战），而并非是论述全体性战争的书：“惟据我今日对克氏这部遗著的研究，认为它确是一部不朽的武力战或军事战的名著，不是把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及武力战冶于一炉的全体性战争的书。”⁽³⁰⁾“克氏在其著作中，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他是侧重于外交方面，并没有论及

内政应采取如何方式。虽有多少关于经济战、宣传战和间谍战的言论，但分量上未免太不够了。再就他在武力战上而说，因为克氏的眼界太局限于大陆，所以他没有提到海军问题，陆军与海军联合作战问题，又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谈到空军，亦为必然之事。”⁽³¹⁾李浴日站在现代立体战争的立场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忽略之处做了扩展和延伸。认为“现代战争是全体性战争，即动员全国的力量用于战争的竞赛上，其形态分为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军事战，但仍以军事战为骨干……在这个新战争的洪流中，倘若有人还想仅凭军队的作战以制胜，其愚真不可及。倘若人家以全体性战争加诸我，却不能发挥全体的力量来应战，实无从克敌。要之，每一个国民均须参加战争，每一个国民的生活均与战斗条件一致。”⁽³²⁾他在《中山战争论》和《孙子新研究》、《兵学随笔》中对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间谍战等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说明李浴日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克氏战争理论问题，擅长用战争学理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李浴日军事思想的可贵之处，这是他对克氏军事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五）关于防御与进攻的关系

防御与进攻是最基本的作战形式，也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阐述的重要军事学理之一。李浴日认同和重视二者的关系，从学理解析和学理应用方面进行了阐述和发挥。

1、防御与进攻的关系

李浴日在台湾版《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序言、《从克氏〈大战原理〉论台湾攻防战》等文章中，对克氏的守势和攻势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引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个内容：第一，防御和进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即防御亦伴有攻击。如说：‘守势本身的目的，在维持现状，于每一部分上，欲歼灭敌军，则常要伴着攻击的各种动作。’（第六篇第一章）攻击亦伴有防御：‘战略攻势常伴有防御，正如战略守势不是绝对的待敌和防止，常为击灭敌人而伴着攻击的动作，即战略攻势是攻守两种行动不断的交替与结合。’”⁽³³⁾说明防御与进攻是相互包含的，互相渗透的，它们都不是单一的整体。而这里所说的防御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而是积极的防御。第二，防御是比进攻更为有利的作战形式。李浴日认为，就攻防作战形式而言，防御比进攻更为有利是由于克氏指出防御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守势的价值有“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从战术

上比较攻防两种手段的利害，“攻者实行全体的奇袭为有利，防者则以实行部分的奇袭为有利，攻者须企图包围攻击其全体为有利，防者则以完成部分的包围企图为有利，至于地利专属于防者。”从战略上比较攻防两种手段的利害，“攻者战略上的奇袭比较战术上的奇袭，其效用更大，但非乘防者的过失不可，且此种现象不常有。防者乘攻者兵力分离之际，而奇袭之，利益属于防者。攻者火力包围的不可能及交通线当侵入敌国时，易发生弱点，防者在战术的场合较可减少退路的威胁，及活用内线的效果。攻者侵入敌地愈广，则战场之补助作用效果愈减少，防者则有要塞的协助，粮食及补给等的便利。防者有国民军的协助，民众武装的蜂起等利益，而攻者则无，又地形之利专属于防者，而攻者则无。至于攻者虽具有精神的优越，但防者凭将帅的才能，而巧为利用之，则尤优。”⁽³⁴⁾其次，守势会战中的要塞或防御阵地的价值远比攻势大：“即攻者不能使用国境附近的要塞，反之防者却可适切在利用深设于内的要塞。”再次，在国内防御上，防守者可以得到民众的协力支持，“反之，攻者欲向民众课征时，要出以武力的强制，则很困难和麻烦，民众的协力愈密切时，便变为武装蜂起，即武装自动参战。”最后，防者可得到“同盟者”的同情与支持：“国际间利害的错综，足以促进政治的均衡，并有维持现状的倾向，故防者为维持现状采取自卫行动，便易取得同盟诸国的同情与协力，成为有利的援助。”李浴日通过以上引述，并比较攻防两种作战形式的优缺点，进一步确立了守势在攻防上的地位，从而说明克氏关于“守势比攻势为更有利的作战形式”的结论为正确的。第三，防御与进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如果说成功的防御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那么进攻也不自觉地转为防御。”“‘以近待远’，照普通的解释，为我军先到战场，占领战地，迎击从远方进击而来的敌人，即解为采取防御态势者亦多；然而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上所说：‘防御之后，断然转为攻势。’那还不失为真理。”（《孙子新研究·军争第七》）表明攻防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交替和变化。

防御与进攻的辩证关系是克氏在综合总结当时欧洲各国抗击法国入侵的战争经验的基础上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李浴日对这个结论进行解析和归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攻防关系的内在规律”，揭示了战争攻防关系的本质。

2、防御与进攻关系的学理应用

(1) 关于抗日战争。“克氏的学理曾支配了十九世纪，毛奇一战而胜丹麦，

再战而胜奥国，三战而胜法国，就是通用克氏学理的结果。洎乎今日，虽因战争时代的不同，但克氏的基本原理依然不变，各国军人犹奉为经典。”如前所述，依据“攻势”和“守势”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这个战理，李浴日以此预测和分析抗日战争：日本处于攻势，具有攻势的优势和弱点，中国处于守势，具有攻势所没有的优点。日本的速决战既然不能实现，那么它所面临的将是持久战。在持久战的进程中，将会出现战略防御、战略反攻的情况：“这次中日战争正在进行着克氏所说的‘现实战争’，或持久战，我们正采取着克氏所认为最有利的守势战略，实行国内退军，取得时间余裕，增强战力，待机反攻。”⁽³⁵⁾这个战理在其后出版的《战争论》的序言中给予概括和补充。以此而论，抗日战争必将取得胜利（详见拙作《李浴日抗日战争理论述论·速决战理的依据》）。事实证明，李浴日运用这一学理对整个抗战的判断和分析是正确的。

(2) 关于台湾攻防战。1950年6月，李浴日到台湾后出版了《台湾必守铁证》一书。在该书第四章，他再次运用防御和进攻关系战理分析台湾攻防战（后他又以《从克氏〈大战原理〉论台湾攻防战》为题收入台版《战争论纲要》附录里）。

李浴日在该论文中，详细引述克氏关于“守势比攻势为更有利的作战形式”的战理证明台湾在攻防战中会取得胜利。克氏认为，守势比攻势之所以更有利，是因为守势具有攻势所没有具备的优点，这是比较攻防之间的利弊得出的结论。他指出，守势的价值有“等待之利”和“地形之利”：防者具有地形（要塞、阵地）、民众武装和同盟者支持等条件（详见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依此战理，台湾攻防会战，“共军”为攻者，“国军”据台湾为防者，台湾拥有海、陆、空的军事优势，拥有同盟者（如美国）的支持，“拥有过去日人所惨淡经营而又经过加强的基隆、高雄、马公诸区要塞”，“……占有优势的有利地形。如前线据点金门、马祖，及台湾海峡，即等于克氏所说的足以制敌死命的‘国土钥匙’，如果共军对这些钥匙没有办法打开，休言攻台。而我们守台亦以拒止共军于台湾海峡之外为上策。”⁽³⁶⁾

李浴日从当时国际背景出发，试图对台海两地作战的环境、条件做战理上的应用。其所谓的反攻，就是坚守台湾，以台湾为跳板（并不是希望独立台湾或让外族占领台湾自己充当傀儡），期待来日组织有效的渡海作战，反攻大陆，恢复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而防守的注脚即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建设美好台湾。当

时在蒋介石刚刚退守台湾的情况下，它为巩固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鼓舞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士气、安定台湾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台湾蒋介石政权制定维持台海和平现状政策、建设美好台湾也有借鉴之处。不过，克氏攻防战理却不适用台湾问题的解决，这是李浴日学理应用的不足。台湾问题的解决用不上攻防，倒是更符合应用孙子兵法关于“全国为上”的战略，即走和平统一道路。

今天，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岸关系已从敌对走向“三通”，两岸经济与民间往来更加密切。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双赢。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主要靠两岸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审时度势，本着对历史负责、面向未来的求实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历史的抉择，靠海峡两岸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台湾回归祖国势所必然，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而且越快越好！

（六）概念性战争和现实性战争

1、概念性战争和现实性战争及其关系

概念性战争和现实性战争，是克氏提出的关于战争的一对基本概念，也是分析战争形态的重要军事学理。它集中反映了克氏考察战争问题时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研究特点。李浴日在探讨韩战问题时，对这对概念的性质及其关系做了引述、分析和归纳。

首先，这两种战争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克氏在《战争论》上把历史上的战争性质分为两种——一是‘概念的战争’，一是‘现实的战争’（即永久法则）。”概念性战争，即绝对战争、抽象战争，是指原始概念固有的按其自然趋向所表现出来的形态。它只存在于抽象的逻辑理论之中，是一切战争的原始形态，具有如下的特点：“……克氏所说概念战争的性质是战争行为的无界限性：（一）暴力使用的无界限性；（二）打倒感情的无界限性；（三）力之发挥的无界限性。换言之，纯为武力主义，亦即歼灭战争。”⁽³⁷⁾也就是说概念性战争具有极端性、抽象性等特点，与现实性战争是互相排斥的。

现实性战争，又叫具体战争，实际的战争。是指战争原有的趋向受到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以区别于本来面貌的形态。它具有如下的特点：“克氏就‘现实战争’的性质分析说：‘政治目的对军事行动的支配力愈大，则军事行动愈迟缓。’（第一篇第一章）又说‘战争的动机与紧张性微弱时，’则暴力必遵从政治指定的方向而行动，战争愈与政治相近似。’（同章）又说：‘在现实战争上，

一方不能完全剥夺他方的抵抗力时，则彼我双方俱从事于胜败，及其所必要消耗之力的推测，因而造成媾和缔约的动机。’（同章）又说：‘战争的动机微弱时，则战争的本质，如互相作用、竞争、猛烈性、无拘束性等完全消失，彼我两军，俱不冒险，仅运动于极狭隘圈内’，极其量亦不过以恐吓手段，对付敌人，使有利于外交谈判，以结束战争而已’（第八篇第三章）”“‘一国与他国缔结攻守同盟以援助时，但所得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他国决不会放弃本身的利益，而认真援助之。’又说：‘当两个国家协同对敌作战时，其中必有一方无意于积极协助，以征服敌人，先考虑本国的危险与可得利益，然后出兵相助，正类似商业交易，不使资本遭受意外的损失，在这种场合，军事的目的全受政治影响以至支配。’（第八篇第三章）”以上是从战争的政治目的、动机、媾和缔约、同盟者利益等外在因素对战争的影响进行概括现实性战争特点的，说明战争总是受战争以外力量的影响。也说明现实性战争具有具体性、不完善性等特点。

其次，这两种战争是密切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也就是说概念性战争反映战争固有的基本形态，它约束、度量现实性战争。反过来现实性战争是体现战争发展变化多样性的具体形态，它可以“补充”、“修正”概念性战争。

李浴日关于克氏概念性战争和现实性战争及其关系的引述和分析，对分析各场战争的形态，通过各种战争现象探讨其实质，有着重要的启发。

2、学理应用。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后被称为韩战（即朝鲜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中、苏等18个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它是冷战背景下进行的一场实际战争。李浴日称之为“局部性的世界战争”。在战争爆发一年多的1951年9月，李浴日在《实践》杂志上发表了《从克氏〈战争论〉论韩战》的著名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运用上面克氏关于概念性战争和现实性战争（即永久法则）的军事学理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对这场战争的形态进行了判断，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

李浴日认为，这场战争是现实性战争，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韩战各方未能发挥无界限性战争行为，决定这场战争是‘现实战争’或有限度战争。他首先从克氏关于“概念性战争”的形态入手，比对参加韩战的美、南韩、北韩、中、苏、英各国作战目标、计划，得出这次韩战不具有概念性

战争的特点，而是现实性战争：“……美国政府限制自己空军不得轰炸共军的‘庇护所’东北及中国大陆，海军又不得封锁中国大陆沿海，且迄未使用具有最大毁灭性的原子弹。显然的，美国政府是不欲使战争行为作无界限性的发挥，成为‘概念战争’。虽说最初北韩进攻南韩，似乎想采取此种战争方式击溃南韩，甚至要把联军驱逐下海，却未成功。中间麦帅指挥大军由仁川登陆，直趋北韩，亦近此种方式。因共军的突然参战，亦未成功。实在说，韩战的性质乃属于克氏所说的‘现实战争’，亦即美国当局所宣称的‘有限度战争’（同书第一篇第一章）。“……斯大林亦迄未敢以其自己的陆、海、空军作无限度的参加韩战，于是战争愈受现实的政治所支配，不能发挥无界限性的行为，充分发挥武力的价值，便成为‘现实战争’，亦即消耗战争。”（38）

第二、韩战各国边打边谈边拖、战火不再扩大的动机，具有把战争还原于‘现实战争’的性质。接着他又从克氏关于“现实性战争”的学理分析此次韩战各国出现的种种战争现象：美国军事行动迟缓，“始终不做武力无限性发挥”；出现马立克之和平建议；开始媾和缔约的开城谈判但无结果；韩战迄未扩大到韩国以外的地区；双方用恐吓手段以促成外交谈判等等。说明此次韩战是“有限度战争，亦即把战争还原于‘现实战争’的性质……这就是‘现实战争’的必然表现。”（39）

第三，“同盟者”英国在此次韩战中出于考虑本国的危险与可得利益，不会放弃本身的利益，而认真援助韩国，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说明此次战争是现实战争。（40）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李浴日认为这场战争属性是现实性战争，美、中、苏、韩、朝等交战各方处于胶着状态，各方都未能占有战争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它是消耗战争。当然，他依据战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学理认为，这场战争比历史上的‘现实战争’都复杂，故双方不易媾和。弄不好战争性质会发生变化，甚至发展为“概念战争”，即“无限度战争”。

韩战是“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二战以后以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立为背景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它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遏制了美国向朝鲜半岛北进的意图。加强了苏联对北朝鲜的控制。李浴日站在战学角度论述韩、朝、中、美、苏各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次战争的形

态是现实战争，即消耗战争，具有远见性。他是韩战中唯一一个用克氏军事战略分析这次战争形态的军事学者。

（七）用《战争论》与《孙子兵法》进行比较。

李浴日在《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东西方兵学代表作之比较研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序言》中，把《战争论》与《孙子兵法》进行相互比较，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1）二者的共同点：一是著作的目的相同；二是战争的原理、原则相同；三是二者崇尚“伐国”思想相同。（2）二者不同点：一是著作形式不同；二是哲学思想来源不同；三是在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着眼点不同；四是写作的侧重点不同等（详见拙作《试论李浴日的孙子兵法研究》）。

除了上面的论述之外，李浴日还就战争的目的和手段、暴力之无限界的行使、克氏战史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八）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不足

虽然，李浴日认为：“克氏《战争论》是世界军事名著，也是一种战争哲学，不特军人应该精读，即一般思想家亦应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顾问及一切与政务有关者的枕中秘本。”⁽⁴¹⁾但同时他也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克氏战争理论存在着许多不足。如对战争目的的阐述，就明显带有黩武主义思想：“克氏《战争论》最坏的影响，“就是他过度颂扬‘绝对战争’的思想，力断‘战争为暴力无界限的行使’，及反对战争哲学中混入‘博爱主义’，因此养成德国军人极端残暴的性格，表现于上次欧战如此，即这次欧战也是这样。欧洲文明殆为纳粹所摧毁了。”所以他主张：“我们研究克氏的理论，应排除其渣滓，摄取其精华才可。”又如克氏论述全破主义时主张实行歼灭主义：“从正面而论全破主义的，有克劳塞维茨将军，彼关于‘歼灭主义’说：‘有恻隐之情者，也许这样相信吧？对于敌人不加以多大损害，而解除其武装，或不讲求击破的方法，而认为是战争术策的正当倾向；这种说法，在外观上虽是美丽，实际则成为谬见，我们非把这种谬见打破不可。’”⁽⁴²⁾李浴日认为“这无异驳斥孙子言论的错误。”再如克氏关于暴力之无限界的行使时指出：“彼又关于暴力之无限界的行使说：‘战争是暴力行为，其行使没有什么界限；所以某方行使暴力，他方就不得不酬答以抵抗的暴力；这样所生的互相作用，在概念上，是没有极限的。’”李浴日引用日人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的话做了阐释：“要之，敌国的人民，不问老幼男女（仅有直

接与间接之别), 都一样成为敌军战力的因素; 故战争的本质, 可以说是在消灭敌人之肉体的抵抗与心力的抵抗。虽然, 倘若不经流血与破国, 而能屈服敌人的方法也有, 则彼(克劳塞维茨)也不会反对的。因为, 孙子是从大的政略上论理想的兵法, 克劳塞维茨系依交战手段, 以屈服敌人的实际行为作轴心。”⁽⁴³⁾ 这些均说明李浴日已经注意到克氏战争理论存在的偏颇, 这对探讨德国军国主义的渊源以及在全世界(如日本)的流布和影响, 都有重要的启发: “日本自维新以来, 拼命模仿德国, 尤以兵学上受德国的影响为大, 因之所受德国兵学上侵略思想, 黠武主义的影响亦大, 于此可见盲目的抄袭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研究克氏的著作, 就不要为他侵略的思想所影响。”这是李浴日研究克氏军事理论的可贵之处。

除此之外, 李浴日对克氏关于战争的根源、战争的目的、战略战术、战史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评述和分析。

三、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 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扩大的过程。《战争论》传入中国首先是日文。1908年中国《战略学》教科书就糅合了《战争论》的基本思想, 1910年冬之前, 清政府军咨府翻译了《战争论》前六篇, 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潘毅等延请同学何润珊、瞿寿禔补译, 1911年3月, 中国第一部《战争论》完整译本由陆军教育研究社刊印, 起名《大战学理》(参看宋泽滨《〈战争论〉在中国: 百年传播及研究综述》)。抗日战争前后, 《战争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关于克氏《战争论》的译本, 亦有好几种, 如瞿寿禔的《大战学理》, 训练总监部的《战争论》, 陆军大学的《战争论》, 黄焕文的《大战学理》, 柳若水的《战争论》, 傅大庆的《战争论》(仅出有上册, 尚缺下册)此外, 尚有我(指李浴日, 笔者注)正在译中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成田赖武著), 至于孙子和克氏的兵学研究论文, 散见于各地报章和杂志上, 为数也不少。”⁽⁴⁴⁾ 从整体看, 《战争论》早期译本质量参差不齐、译编并重, 一些研究成果存在概述较多、深入不够的缺陷, “但对推动学习研究《战争论》, 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⁴⁵⁾

李浴日翻译、编辑和研究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是国民政府军事学界翻译和研

究《战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历史作用和贡献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对《战争论》在中国的普及和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浴日学的是政治学专业，有扎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其治学严谨、认真。他灵活运用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包括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广泛联系西方军事思想史及近、现代战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对克氏战争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分析和评价，并进行相关学理应用。虽未整理成书出版，但基本梳理出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体系；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可视为对克氏战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他能延寿天年，一部完整的克氏战争理论研究必能问世！

二是服务于抗战的。抗战时期，由于敌军的封锁，战争理论读物非常缺乏，各级军事将领和广大民众十分需要它们做战争指导。为了适应这个需要，李浴日加紧翻译、编译和研究，积极为抗战服务。正如林薰南在1943年5月出版的《〈东西方代表作之研究〉序》中评价说：“李浴日先生为富有研究精神之时代兵学家，现任世界兵学编译社社长，当中日战争启幕未久之际，而有《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译著，兹值抗战与侵略、民主与纳粹两大力量在东西两方面做最后决斗之今日，复有《东西方代表作之研究》之编纂，以阐发和贯通二氏最高斗智之指导和秘诀，希望我国每一个时代战斗员人手各一编，而从中觅得和把握孙、克二氏之兵学神髓，其用心之深长，不难体会。以运用于各个作战场合，吾深信其必所向有功也。”

三是为构建中国军事学体系提供借鉴作用。《战争论》结构严密，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理论体系。李浴日站在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立场上，批判地吸收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军事思想，为民国时期中国军事理论注入了有益的成分。他说：“所谓中国本位的兵学，其本质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内容则依于国情及对象而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了解中国固有的兵法，时代环境的需要，及世界各国的兵学。我们不能固步自封，离开时代，也不能盲目抄袭，全盘移植。我翻译这部兵书，如能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尽了多少义务，那也算于愿已足了。”⁽⁴⁶⁾邓文仪在《李浴日与中国兵学》中高度评价他的翻译、编纂和研究工作：“……李先生又编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及《兵学随笔》二书，更具体的把中国兵学与世界兵学之联系研究及贯通阐扬，提供重要参考资料。这些重要著述，不仅对过去的中国兵学有重要贡献，而且对于未来的中国兵学也有重要启发。”⁽⁴⁷⁾事实

正是如此。

不过，虽然李浴日在某方面自觉接受马克思经典哲学家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观点，但是，随着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丧失，李浴日到台湾后思想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后任国民党金门防卫高参，且逝于任上，为蒋介石最放心、最信任的人选之一）。这一时期他对部分学理的阐释和运用就带有深刻的社会痕迹和阶级烙印，这些都反映了李浴日的时代局限。

时间进入 21 世纪，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流。但是，战争的阴霾不散。这让我想到李浴日的话：“我老实告诉你，今后的世界是不会永远和平的，你们还是空谈和平，坐让敌骑蹂躏，抑是脚踏实地接受战斗的学术起而自强自卫？”⁽⁴⁸⁾研究李浴日的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世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把战争消灭于萌芽状态，与世界各兄弟民族携手前进，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这才符合李浴日研究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的根本目的。

2012 年 2 月

注释：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33) (34) (35) (36) (46) 成田赖武著、李浴日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40 年 2 月成田赖武序、1943 年 11 月李浴日译序、1945 年 10 月杨言昌序、1945 年 10 月杨言昌序、1955 年春徐培根序、1947 年 4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第 229—230 页、1951 年 9 月李浴日序、第 229 页、1943 年 11 月李浴日序，1956 年 6 月台湾版世界兵学社；

(6) (30) (31) (44) (48) 李浴日《孙克兵学新论》第 178 页、1943 年 6 月编者序第 3 页、1943 年 6 月编者序第 3 页、1943 年 6 月编者序、1943 年 6 月编者序，1947 年 1 月世界兵学社；

(16) (18) (32) (37) (38) (39) (40) 李浴日《兵学随笔》第 1 辑第 2 页、第 1 辑第 2 页、第 1 辑第 4 页、第 4 辑第 141 页、第 4 辑第 141 页、第 4 辑第 142 页、第 4 辑第 142 页，1952 年 5 月台湾版世界兵学社；

(17) (42) (43) 李浴日《孙子新研究》第 4 页、第 51 页、第 51 页，1946 年 8 月世界兵学社；

(20) (夏征难《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第 95 页，1989 年 3 月解放军出版社；

(21) (23) (25) (26) (27) (28) (29) (41) 李浴日《中山战争论》第 96 页、第 98 页、第 100

—101 页、第 25 页、第 25 页、第 24 页、第 96——97 页、第 25 页；

(24) (李浴日《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战争与政治》第 48 页, 1942 年 7 月世界兵学社；

(45) 宋泽滨《〈战争论〉在中国：百年传播及研究综述》，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50 期第 9 版；

(47) 邓文仪《李浴日与中国兵学》，载 1955 年 9 月《战斗月刊》第三、第四期合刊。

参考书目：

- 1、李浴日《兵学随笔》；
- 2、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
- 3、李浴日《中山战争论》；
- 4、李浴日《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
- 5、李浴日《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
- 6、李浴日《台湾必守铁证》；
- 7、张伯亭《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之研究》，1957 年 1 月台湾实践出版社；
- 8、夏征难《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1989 年 3 月解放军出版社；
- 9、吴琼《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2002 年 1 月上海教育出版社；
- 10、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 年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介绍：

李龙，1966 年 10 月出生于雷州半岛一个普通农家。大学本科毕业。长期以来，致力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收藏，为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间主要学者之一。现为湛江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湛江海洋大学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员，雷州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电子邮箱：leizhoulilong@163.com